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

——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考察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为宏伟蓝图,以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为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取向,以国家工业化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以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为政策取向,统筹兼顾以工业化为重点的各项建设,统筹把握艰苦奋斗、自立自强进程中人民的长远幸福与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初期过紧日子度,以此为内在规定性,对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行了开创性探索,探索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城乡关系政策体系,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带动,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基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这一探索进程中提出了独创性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 毛泽东; 工农城乡关系; 剩余转移;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D61;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23)06-0054-09

DOI:10.16207/j.cnki.1001-5957.2023.06.005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构建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行的开创性探索,是基于中国作为落后的工业化后发国家,为实现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目标展开的。

一、从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国家工业化和巩固发展工农联盟统一出发,探索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剩余转移关系

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工农联盟、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已有对毛泽东关于走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的研究,就农民群体内部而言,主要是围绕引导个体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径进行探讨。实际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从更广阔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视角,对走共同富裕道路和巩固发展工农联盟进行探索。在实施以工业建设为重点的国家“一五”计划之际,中国共产党就致力于在全社会形成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全体农民富裕起来,也才能使农民利益同国家利益、工业化利益、工农联盟利益相一致的认识。^①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任务是,不仅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还要改变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的落后状况,推进国家工业化,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自立自强。这一目标取向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构建社会

收稿日期:2023-08-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10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2021mgczd009)

作者简介: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1月16日。

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的内在规定性。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考察发现,毛泽东关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是从内在统一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巩固发展工农联盟出发,不仅包括农村内部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还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体而言,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探索,不是仅限于在农村范围,其中之一是在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这一更高层次展开,基于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的大局,坚定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在以大仁政为重点并兼顾小仁政下把握好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度,构建起有利于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工农剩余转移的政策体系。

(一) 以国家工业化为全国人民最高利益和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如既往地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并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新的时代命题构建新的工农联盟。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时代命题及实现路径,从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转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中在经济上的重点是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实现经济在国际上的自立自强,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在国际上政治地位的提升。新中国在启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人民日报》发表的1953年元旦社论在强调经济建设的总任务是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的同时,号召为工业化这一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即“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①围绕国家独立的工业体系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重点发展工业与发展其他各项事业的关系,其中的要义之一是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通过巩固发展新的工农联盟,聚集国家工业化的力量。1955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提出巩固工农联盟要以国家工业化为基本条件,即“工农联盟的新关系和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必须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互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和加强起来”^②。

新中国在推进以工业建设为重点的现代化进程中,与世界上工农城乡发展“两个趋向”^③的第一个趋向一致,都是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改革开放时期的学术研究将其概括为农业向工业转移剩余或农业养育工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这一宏伟蓝图的绘制,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推进工业这一现代化先导产业发展,以此为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这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从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促进落后的农业国向强大的工业国转变,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的命题出发,选择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④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⑤1951年12月,毛泽东在提出首先最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础上指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⑥《人民日报》发表的1953年元旦社论向全党全社会宣告“为了保证国家建设的投资,就必须有重点地使用资金,把资金主要用在对国家命运最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上面,即重工业的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反对百废俱兴,反对要在短期内把一切‘好事’都办完的观点。”^⑦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启动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就认识到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政策的必要性。这正是工农城乡发展“两个趋向”中的第一个趋向。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工农城乡发展“两个趋向”的理论认识,政策体系中也没有农业养育工业这一概念。在这种认识和话语条件下,毛泽东将仁政细分为大仁政和小仁政,将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为宏伟蓝图重点发展工业作为大仁政,将单纯照顾农民作为小仁

① 《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1月1日。

②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56页。

③ 参见《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7页。

④ 《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7—98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80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⑦ 《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1月1日。

政;指出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是帮了美国人。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一致,这一基础不容破坏。这些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的精辟论述,统一了全党全社会对选择农业向工业适当提供积累的认识。

中国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且要提供的积累更多和更为艰难,是因为有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所处的不利位势以及摆脱这种不利位势必须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因素。一方面,中国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选择,是在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且剩余较低的发展水平下作出的。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在1950年仅为77元,到1956年也只有142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少,在1952年仅1.5元,到1957年也只有5.4元^①;全国财政收入在1950年仅62.17亿元,到1957年也只有303.2亿元^②,1949年10月至1957年底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仅796.51亿元,平均每年不足100亿元。^③可见,中国启动工业化战略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先发国家起步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二三百美元相比,有较大差距。中国在工业化起步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西欧和西方衍生国水平的1/12。^④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对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统计表明,中国仅27美元,远低于同期印度的57美元,也低于亚洲的44美元。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更为艰难,因为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推进国家工业化,不但不可能在国际上进行融资,或像西方列强那样通过殖民掠夺获取资源,反而还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一致的封锁禁运打压,所以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立自强之路。这一中国工业发展中的难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才能破解。具体而言,在以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全国人民共同绘就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这一宏伟蓝图作为动员令,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聚集发展力量,包括一方面选择实施高积累、低收入、低消费政策,全国人民在生活上共同勒紧腰带过紧日子,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另一方面通过农业生产合作化、农产品低价统派购等,保障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政策的顺利实施。

(二) 以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内在规定性把握好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度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为宏伟蓝图,以国家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以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为政策取向,统筹兼顾集中力量办工业这件大事与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统筹把握艰苦奋斗、自立自强进程中人民的长远幸福与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初期过紧日子的度,以此为把握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度的内在规定性,探索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具体措施,形成包括工农投资、工农业产品交换、工农财税、农产品在工农间的分配、工农收入分配等政策体系。

在工农投资上,既重点保工业,又防止忽视农业。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必须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同时,还强调“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现在我们在粮食、棉花上打算盘。中国从大清帝国开始,就从外国买棉花、粮食、石油,现在我们如果还把外汇都用来买这些东西,哪里有钱买机器搞工业建设?所以,要先解决棉花、粮食的问题。”^⑤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实现协调发展出发,论述了工农投资比例问题,强调“我们现在的問題,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⑥“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⑦“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

① 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628页。

② 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620页。

③ 《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5)》,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④ [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⑤ 《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7—98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①

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上,尊重价值规律,把握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度,制定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政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是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实现路径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把握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度,并主张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实践中制定实施合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1950年下半年,各地反映,在农业生产恢复较快情况下发生农产品供过于求现象,这导致粮食价格下降,且市场价低于国家牌价,与工业品及纱布价格上升形成反差。农民对此不满。鉴此,这年9月19日,华北局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国家一方面按照牌价大量收购粮食(为此全国要不惜积压50亿至60亿斤),另一方面适当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方案。毛泽东批示“我认为华北局的意见是正确的,请陈(云)、薄(一波)即根据华北局所提各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具体方案,于数日内向中央报告一次,并迅即推行。此事极为重要,不能久延不决。”^②毛泽东还强调要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956年,毛泽东指出“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剪刀差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③毛泽东主张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他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④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醒说“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⑤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⑥1959年,鉴于农产品价格是一个涉及众多利益主体的问题,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指出“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⑦“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当地等价。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⑧在实践中,尽管明确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取向,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较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据专家测算:1952—1978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44.9%。^⑨从农业部门聚集的净积累,1952—1957年为475亿元,是同期财政收入的30.9%;1959—1978年为4075亿元,是同期财政收入的21.3%。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商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第563页。

③ 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毛泽东与中国农业——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8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7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490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493页。

⑨ 严瑞珍等《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生存、改革、发展》(1988),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289页。

在工农税收政策上,实行工农二元政策,但注重规范税收和减轻农民负担。新中国选择征收农业税的政策,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看,一方面是对古代征收农业税的延续;另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仍处于农业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主体,195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高达50.5%。在这种产业结构下,农业税必然是国家的重要税源。不过,中国共产党选择实行征收农业税政策要实现的功能,与封建社会征收农业税用之于、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不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服务于人民,其中主要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这也是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外,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的另一条路径。鉴于这一功能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尽可能把征收农业税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农民,是因为不仅让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解放,还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军民兼顾的负担政策,这既保障了对战争的支撑,又力所能及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和改善了农民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坚持农民合理负担原则,并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减轻农民负担。1958年6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明确规定“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点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为了办理地方性公益事业的需要,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但一般不得超过纳税人应纳农业税税额的15%;在种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比较集中而获利又超过种植粮食作物较多的地区,地方附加的比例,可高于15%,但最高不得超过30%。这些对征收农业税的规范,为把农民负担控制在合理范围提供了规范的制度保障。

在农产品工农间分配上,反对竭泽而渔。1952年10月14日,陈云向毛泽东并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报送了一份关于江苏省青浦县小蒸乡农民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农民由于农业歉收、征粮过重和人多地少,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次日,毛泽东给谭震林写信,要求认真解决此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关心农民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给农民留足粮食。毛泽东反对在农产品统派购数量上实行高征购,批评高征购是竭泽而渔。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①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以苏联和中国“大跃进”运动中搞“高征购”的教训为鉴,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深刻地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②中国共产党通过实施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政策,将粮食增收部分留给农民,调动了农民增产的积极性。

在工农收入分配上,注重逐步提高农民收入。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把握好农民增收和农民对工业化作贡献两者之间的度。1956年4月18日至24日,毛泽东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指出“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年年个人收入有所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财政一节,说还想从农民多要一些,很值得研究,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税一百七十亿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税加小学下放共达三百七十七亿元,已经加了很多。对农民总要经常照顾,不要一下使农民收入大为减少。去年就是一个大教训,多收入六十至七十亿斤,全体农民都骂我们。我们减少了征购,实行了‘三定’,又加上丰收,因而改骂娘为鼓掌。”^③同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指出“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④

从实践看,尽管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影响了自身积累,但由于到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发展反过来为农业提供了大量机械、电力、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要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③ 《毛泽东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的谈话纪要》,《党的文献》2004年第1期。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素,这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其显著标志是全国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0万吨增加到1976年的28630.5万吨,在全国人口由1949年的54167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93717万人的情况下,将人均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208.9公斤提高到1976年的305.5公斤。这表明,以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为取向构建的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尽管存在城乡分割和二元结构固化的结构性偏差,但实现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支撑国家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预期,而在21世纪初基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经济社会阶段后,国家将农业养育工业转换为工业反哺农业,也就顺利实现了大仁政的周期转换。这验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方略的高瞻远瞩。

二、从共同富裕出发,明确把农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的发展目标并探索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实现路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工农城乡差别,从走共同富裕道路出发,明确把农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的发展目标,并探索形成了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实现路径。

工农城乡差别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它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痼疾,突出表现为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解决这一结构问题的艰巨复杂性,需要具有历史耐心才能加以破解。近代中国虽然处于农业社会,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抗日战争时期一记账本呈现了中国在近代城乡关系具有的二元特征。^①中国进入近代,农业发展除继续受封建制度桎梏外,又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剥夺和战争破坏,雪上加霜,农村凋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农民动员和凝聚起来,并将他们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的革命性和城乡二元差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认识到农民的革命性缘于他们深受封建剥削压迫,以及受帝国主义者强制输入外货,导致在价格增长上一般日用品远超过农产品,使农民的手工纺织等副业被摧毁^②,农民受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③。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主张城乡发展兼顾和把农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工作重点即将从农村转到城市之际,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制定“一五”计划时,正视农业发展过分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矛盾,将克服这一矛盾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一个重大任务,同时把防止和克服农业同工业脱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重大而又迫切的任务。^⑤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指出“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⑥换言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工农城乡差别,将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一发展目标明确为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新要求。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在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上实现突破出发,经济建设以工业为重点,并通过农业对工业提供积累和全国人民过紧日子,以此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基于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方略,面对城乡差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发展过分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矛盾进行了有特色的探索,即除了通过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工业,进而实现向农业提供现代生产要素和向农村提供现代生活用品外,一方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促进农业生产、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发展;另一方面构建

① 袁为鹏、黄英伟《抗战时期一位企业管理者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透视:来自董士账本(1936—1942)的证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3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63—36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7页。

⑤ 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55年7月8日。

⑥ 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毛泽东与中国农业——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

工农商学兵结合的社会结构,探索形成农村发展工业和农民就地变工人之路,尽可能弥合城乡差别。

毛泽东关于构建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农村社会结构,经历了提出和发展的过程。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山东农村时,提出人民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①经过1959年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对实践的思考,农村发展工业实际上成了以工业为重点、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条件下,繁荣农村经济社会,进而缩小工农城乡差别的实现路径之一。有的研究对毛泽东关于构建工农商学兵的农村社会结构加以否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构想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以此历史逻辑将构建工农商学兵的农村社会结构认定为空想。将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农村社会构想纳入长时段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是克服农村边缘化、空心化和实现乡村繁荣发展的战略构想,对中国农村之后的发展产生了长远深远影响。具体而言,从1958年起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通过发展社队工业提高了农民收入和创造性地在农村内部实行以工补农,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成功走出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之路,再到进入新时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这一历史演进一以贯之的是,通过发展工业提供经济支撑以促进农村综合发展,进而缩小工农城乡差别。这一发展社队工业,进而给农村带来光明灿烂希望的实现路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好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优势才能成功探索出来。这还表明,工农商学兵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其中社队工业的发展,是之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开创了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就地转变为工人的路径

从世界工业化实践看,随着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聚集的城市转移,农村边缘化现象普遍发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农村全面发展出发,对在农村发展工业进行了战略构想。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构想地方工业要超过农业产值。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家经济委员会在起草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中提出“在干部中应该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销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这就形成了“社办工业”概念。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农村发展工业的构想,提出“农业社也可办加工业”,“大社可办一些加工厂,最好由乡办,或几个乡镇合办”。^②

毛泽东提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工业,实行工农并举和大中小结合,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分析指出:苏联“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并举。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我们“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③二是农村发展工业是农村实现全面发展的希望。毛泽东在1959年2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④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来达到一半劳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⑤三是适应国情。毛泽东分析指出“我国有一个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中国农村有五亿多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13%,平均每人有二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⑥

^① 《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 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 办人民公社的好处是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② 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毛泽东与中国农业——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

^③ 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毛泽东与中国农业——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⑤ 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毛泽东与中国农业——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⑥ 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毛泽东与中国农业——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根据毛泽东在农村发展工业的主张,社办工业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其中多数是靠刮“共产风”平调财产发展起来的。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民大办钢铁导致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量减少,以及“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泛滥严重影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全国人民吃不饱饭成为第一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保障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决定社队一般不办企业。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临时之举。

国民经济调整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在农村发展工业。1966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①1975年9月27日,毛泽东将浙江省周长庚请求中央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信批给邓小平:“请考虑,此三件^②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意见,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其印发至全国县市以上各级党组织。同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社论和转载《河南日报》报道回郭镇公社发展社办企业经验的全文,引起全党和全国各级领导对发展社队企业的重视。

正是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发展工业的倡导下,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有了有限的生存空间,而农民则以“四千四万”精神艰辛创业,实现了农村工业的有限发展。这一野火烧不尽的草根工业的曲折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发展时期进行贯通考察可见,在农村发展工业,发展社队企业,让农民就地变成工人,在农村探索出工农结合发展之路,也就在农村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工农结合发展关系。实践表明,在农村发展工业和社队企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在农村内部实行了以工补农,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避免了工业化进程中农村边缘化现象的发生,在实际上成为防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工农城乡差距拉大的重要路径之一。

(二) 基于在农村发展工业和中小城市结构性布局创造性提出在农村办小城市的构想

城乡结构如何布局,是关系能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在农村人口是往大中城市里迁移,还是留在农村小城镇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大的转变。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农民进城、当工人的问题,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提出在农村办小城市。这一变化除了构想在农村办工业和让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外,还从大城市对农业人口的承接能力和城市安全等方面考虑。从大城市对农业人口承接能力考虑,1959年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④从城市安全考虑,1959年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指出:“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申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⑤

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加之先受西方国家封锁禁运打压和之后受苏联威胁,基于自立自强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资金和技术密集于一体的工业化战略,一方面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需要将农业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② 指周长庚的信、华国锋给河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报》登载的关于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报告。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197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739页。

人口留在农村而保障低消费高积累的实现,这约束了农业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发生现代化演进中工农劳动力就业转换比工农业产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的偏差。

尽管如此,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发展工业让农民就地变工人、发展农村小城市的构想,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成功走出农村工业化和以此为基础的农村城镇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也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正如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①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城乡关系的成功探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在于以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强大的工业国为宏伟蓝图,以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为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取向,以国家工业化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以兼顾大仁政和小仁政为政策取向,统筹兼顾以工业化为重点的各项建设,统筹把握艰苦奋斗自立自强进程中人民的长远幸福与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初期过紧日子的高度,以此为内在规定性探索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城乡关系政策体系,所提出的独创性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理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行的开创性探索,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带动,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基础。

(责任编辑:张慧娟 责任校对:张慧娟)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ENG You-gu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PC, with Comrade Mao Zedong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took the people's happines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took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backward agricultural country into a powerful industrial country as the grand blueprint, took catching up with the process of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phased goal of modernization, and took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highest interest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policies of great benevolence and small benevolence, the various constructions with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focus, and the long-term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hard work,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with the degree of catching up with the tight tim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orld'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s an internal regulation, we have made pioneering explorations into the socialist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xplored the formation of a policy system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It has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t is the histor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type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era, which ensures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uccessful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o Zedong proposed innovative viewpoints in this exploration proces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theo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Key words: Mao Zed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sidual transfer; common prosperity

^①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79页。